



信仰与变迁

刘夏蓓 著

——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信仰与变迁

刘夏蓓 著

——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与变迁：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 / 刘夏蓓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12
ISBN 978 - 7 - 5097 - 8164 - 7

I. ①信… II. ①刘… III. ①社会人类学 - 研究
IV. ①C91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0813 号

信仰与变迁

——卡力岗人的民族志研究

著 者 / 刘夏蓓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分社(010)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8.5 字 数：289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164 - 7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外祖母郭纯茹

100 周年诞辰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一章 导论：一类特殊的文化现象 / 004

第一节 卡力岗现象	/ 004
第二节 解释此类特殊现象的主要理论与路径	/ 010

第二章 卡力岗人的民族志调查 / 060

第一节 卡力岗现象的承载空间	/ 060
第二节 卡力岗地区的自然环境	/ 066
第三节 卡力岗人的民族志调查	/ 073

第三章 卡力岗人的宗教演变与文化变迁 / 107

第一节 卡力岗人宗教信仰的演变	/ 107
第二节 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	/ 140
第三节 卡力岗宗教演变及文化变迁的基础与条件	/ 161

第四章 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建构 / 187

第一节 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性质	/ 187
第二节 卡力岗人族群演变的基础与条件	/ 197
第三节 卡力岗人族群认同的建构	/ 221

参考书目 / 255

访谈提纲 / 262

附 录 / 265

后 记 / 285

引 言

认同 (Identity) 研究滥觞于哲学, 发展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 在当今世界中, 其所显示出来的社会整合力量越来越令人瞩目。民族认同 (ethnic identity) 是认同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以来, 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之间的关系时而整合为一体、时而分裂为对立, 不时引发民族运动、国家解体、区域独立及冲突战争等, 其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及世界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族群认同研究显示出从未有过的重要意义与需求, 也形成了亨廷顿《我们是谁》、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冈-米达尔《美国的抉择》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著作。族群认同已经成为诸多学科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我国人类学界对族群认同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实证与理论两大类。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族群的概念、族群与民族概念的比较、认同的含义、认同的建构及其功能与作用等问题上, 围绕上述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与观点。近年来, 实证研究以族群认同、民族认同的个案研究成果居多, 虽然观点各异, 但多数研究者深入研究地点,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获得一手资料并展开研究, 为认同研究议题增加了诸多的中国经验, 产出了知识, 探索了方法。

本书就是一个关于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的个案研究，本书的个案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至今仍在继续的“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个案的性质决定了本研究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因此，本研究从历史出发，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获得资料，在此基础上，分析卡力岗人信仰改变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并从地方与国家、社区与社会不同角度与语境切入，讨论族群认同建构的一般规律，区分族群与族群认同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事实与生物事实，反思族群认同理论，从文化、地域（社区 community）、国家三个维度研究族群认同的结构。

本文选取卡力岗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德恒隆乡六个村为田野点，它们分别是回族聚居的藏语村^①德一村、汉语村纳加村，撒拉族聚居的多语村东加村，藏族聚居的若索村和回藏杂居的团一村、团二村。本文运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在参与式观察、访谈及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本研究成果。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在地方语境下，卡力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是一个与信仰演变的互构过程，其主要表现为一个历时过程，即从对藏传佛教组织涣散、社会功能弱化的失望与否定，到对伊斯兰教社会整合、组织社会功能的认可与接纳。在地方空间里，历时近三百年，卡力岗人从信仰佛教的“安多哇”^②演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哦回”^③，成为区别于周边回族与藏族的“藏回”。

（2）在国家语境下，卡力岗人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是以国家对藏传佛教及伊斯兰教的政策互为前提的。同样表现为一个历时过程，即自清中期以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持续打击和对伊斯兰教阶段性的“怀柔”，藏传佛教被严格限制发展，在国家层面丧失部分重要权力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民间权力的合法性。反之，伊斯兰教获得了更多的传播空间，这一切为卡力岗人“藏回”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卡

① 指以藏语为主要交际语言的村庄，村民在家中、阿訇讲解经典、村中的节日聚会和其他公共活动时均使用藏语，因此，称为藏语村；反之为汉语村。多语村则指使用藏语、汉语、撒拉语的村庄。

② 安多藏族的自称。

③ 卡力岗人的自称和当地人对他们的称呼。

力岗人一直保持着缓慢的文化变迁。20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在国家层面归置了卡力岗人回族的国家身份,之后实行的民族政策打破了地域界限,将卡力岗人与全国的回族联系在了一起,从国家层面促成了其回族的民族认同,逐步完成了卡力岗人民族认同建构的第二个阶段,卡力岗人从“藏回”演变为回族,从一个“文化共同体”演变为“权利共同体”。

(3) 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是其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其文化变迁梯度验证了韦伯的“价值决定论”,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的变迁过程。在精神层面,卡力岗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从而改变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层面,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取代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制度,村庄制替代了原来的部落制。在物质生活层面,其生计方式也从牧业生产为主,转化为以农业为主。在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的宗教禁忌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禁忌和道德规范。卡力岗人逐渐确立了以伊斯兰教教规为主导的生活方式并“风俗化”,其语言则由藏语演化为藏汉双语或藏、汉、撒拉多语并用,同时,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进入其语言中,作为最具稳定性文化要素之一的语言的变迁目前还尚未最后完成。

(4) 卡力岗人的族群认同建构梯度与其文化变迁过程相同,同样表现为“先价值认同后文化认同再制度认同”的过程。在精神文化层面上,首先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认同、对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认同的建构。其次是对穆斯林社区生活、伊斯兰教传入社会记忆认同的建构。再次是对多语言现状认同的建构;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则表现为国家语境下,对回族国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对中华民族一员身份认同的建构。

(5) 卡力岗人文化变迁与族群认同建构梯度的主要成因,是伊斯兰教价值观念的决定性作用和国家在场的推动作用。观念对制度的决定作用和制度与观念的互动作用也在该过程中被充分昭示。

(6) 卡力岗人的文化变迁、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建构模式对于“三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本书认为,卡力岗人精神—制度—物质的文化变迁模式在多民族、多元文化、多价值体系的三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同样,卡力岗人宗教—制度—文化的族群演变层次在三多地区亦具有普遍意义;卡力岗人的价值—文化—国家在场的认同建构梯度与层次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第一章 导论：一类特殊的文化现象

第一节 卡力岗现象

一 何为卡力岗现象

在中国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界的青海省海东地区，居住着一支特殊的人群，由于其所居住地区为卡力岗山区，因而被称为卡力岗人。卡力岗山区是由尕加山、尕吾山、路曼山、尕加昂山等诸山组成的一个山系，其隆起于青海省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的南面，横亘于黄河北岸，以绵延百里之长、海拔三千四五百米之高而雄踞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这里也是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及汉文化的交汇之处。

从化隆回族自治县府所在地的巴燕镇出发，沿着到阿什奴乡的县级公路西南行 18 公里便是尕加山，也就到了卡力岗山区的边缘，沿着一条蜿蜒崎岖的乡级公路向山区深处行进，依次经过阿什奴（藏语音译，意为宽广的地方）乡，沙连堡（藏语音译，意为潮湿的地方）乡，最后到达卡力岗

山最深处的德恒隆（藏语音译，意为老虎沟）乡，这里据巴燕镇 39 公里。阿什奴、沙连堡、德恒隆合称卡力岗三乡，目前，三乡共有 53 个行政村^①，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三乡合计人口 24616 人，其中，沙连堡乡 6148 人，阿什奴乡 5310 人，德恒隆乡 13158 人。其人口的民族构成依次为回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阿什奴乡回族占 47%，沙连堡乡回族占 81%，德恒隆乡回族占 82%。其次为藏族，大约 6000 人，然后是撒拉族 1600 多人，还有汉族及其他民族，但人口数目较少，均为近年来迁入者。据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②，三乡目前共有人口 17686 人，其中沙连堡乡 4106 人，阿什奴乡 3881 人，德恒隆乡 9699 人。据统计，外迁是其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卡力岗人引起学界关注的原因并非是其民族构成的多元化。由于青海海东地区“民族走廊”的特殊位置，这里“多民族共居一隅、共享同一族称”的人群较为常见，小有万余人的“家西番”^③，大有整体具有“藏化倾向”^④的青海黄南蒙古族等。卡力岗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人群中约有 2/3 的人是因改奉宗教而发生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改变，由藏族逐渐演变为回族，即学界所称的“昔藏今回”现象，亦称之为“卡力岗现象”。^⑤

本研究所定义的卡力岗现象，主要是指卡力岗人的族群演变和文化变迁，包含以下两个不同场景的语境和三个不同演变内容，其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

① 引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乡、镇、街道数据（2000 年）：青海省乡、镇、街道人口》，<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renkoupucha/2000jiedao/html/J63.htm>。

② 引自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分乡、镇、街道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③ 家西番，“假西番”的转音，即“假藏族”。家西番的含义还有一种说法，即“坐家的西番”，是对那部分最早能够修家立业藏族的俗称。家西番自我认同为藏族，以农业为主，经商或兼营少量牲畜，说汉语（青海方言），目前懂藏语的已不多，他们的风俗中，既有汉族的祭祖、祭灶，也有藏传佛教的传统节日。他们祭奠亲人时，与汉族一样烧纸钱。过春节也贴对联、放鞭炮，过程几乎与汉族完全相同。同时，他们又保留着藏族农历十月二十六日纪念宗喀巴逝世念“岗索”经等藏民族的习惯。

④ 这里指文化上的藏化倾向，详见刘夏蓓《安多藏区族际关系与区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⑤ 卡力岗人因放弃藏传佛教，改奉伊斯兰教，继而发生的文化变迁和族群认同改变，逐渐由藏族演变为回族的文化现象。

首先,在地方语境下,卡力岗现象是指族群认同与信仰演变的“互构”过程,即卡力岗人从对藏传佛教组织涣散、社会功能弱化的失望与否定,到对伊斯兰教社会整合、组织社会生活功能的认可与接纳。历时两百多年,卡力岗人从信仰藏传佛教的“安多哇”演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哦回”,成为区别于周边回族与藏族的“藏回”。

其次,在国家语境下,卡力岗现象是指族群认同建构与国家认同建构的“互构”过程。即自清中期以来,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持续打击,对伊斯兰教阶段性的“怀柔”,使藏传佛教被严格限制发展,致其在国家层面丧失部分重要权限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民间权威的合法性。反之,伊斯兰教却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穆斯林精英逐渐在民间确立了权威,而怀柔政策又赋予了其传播的合法性。由此,在国家层面,为卡力岗人“藏回”身份认同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在此基础上实行的少数民族政策又在国家层面归置了卡力岗人回族的国族身份,直接促成了其回族的民族认同,开始并逐步完成了族群演变与民族认同建构的第二个阶段,即促成了卡力岗人从藏回族群认同向回族民族认同的过渡。而该阶段的族群演变与族群认同建构,国家在场!

再次,卡力岗现象还是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的互构过程,其文化变迁梯度验证了韦伯的“价值决定论”,表现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的文化变迁过程。在精神层面,卡力岗人逐渐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从而改变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建立了一套新的精神文化体系。在制度层面,伊斯兰教的门宦制度取代了藏传佛教的政教制度,村庄制替代了原来的部落制。在生产方面,其生计方式也从牧业生产为主,转为以农业为主。在文化层面,伊斯兰教的宗教禁忌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规则和道德规范。卡力岗人逐渐确立了以伊斯兰教教规为主导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其语言则由藏语演化为藏汉双语或藏、汉、撒拉多语并用,同时,大量的阿拉伯语词汇入其语言之中。^①

① 目前,在卡力岗人中,藏语仍然是其“官方语言”。作为最具稳定性的文化元素,语言的变迁目前还未最后完成,但是,田野调查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均显示,卡力岗人也仅仅讲藏文却不愿意用藏文书写,“在化隆地区确实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即说藏语的回族认为藏文是藏民的东西而不学藏文。”(沈玉萍:《卡力岗现象分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综上所述，卡力岗现象包含丰富的内容，其族群认同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地方空间语境下的族群（ethnic groups）认同演变，该过程与其文化变迁交错展开；二是国家在场的民族（nation/nationality）身份的确认，其实质是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因此，卡力岗现象对于研究两类认同的建构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主要归纳为四个内容和三对关系，四个内容指改奉宗教、族属演变、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变迁，三对关系则均关涉信仰与变迁，是改奉宗教与族群演变的关系、改奉宗教与族群认同建构的关系、改奉宗教与文化变迁的关系。

卡力岗现象是文化变迁的一种模式，本书认为，卡力岗人从精神到制度再到物质的文化变迁模式，在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并存、多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共生的“三多地区”具有典型性；同样，卡力岗人从宗教到制度再到文化的族群演变层次在“三多地区”亦不乏代表性；其从价值到文化再到国家在场的认同建构梯度也具有普遍性。卡力岗现象的实质是两种文化（藏穆）交汇的结果，可以说，哪里有民族杂居，哪里有文化交流，哪里就有可能存在这类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卡力岗现象绝非孤案，事实上，爬梳多民族杂居地区，不乏类似的案例，如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道堂”和青海的“蒙回”、云南的“傣回”和四川的“彝回”，更有拉萨的穆斯林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人^①等，因此，可以说卡力岗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化变迁模式。

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卡力岗现象”至今尚未完全结束，它似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的“活化石”，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一个由改奉宗教而引发的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现象，观察到信仰与变迁的关系，其异常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使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二 卡力岗现象的研究价值

卡力岗现象大约始于清中期的乾隆年间，至今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看，此阶段的宗教演变似乎并不少见，以我国的西域地区为例，历史上就经历了由改奉萨满教到佛教再到伊斯兰教的变迁过程。

^① 沈玉萍：《卡力岗现象分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但是，其与卡力岗人不同的是，这些部落和族群并没有因为改奉宗教而发生族属变化，他们往往由信仰佛教的某一民族，演变为信仰伊斯兰教的某一民族，虽然改奉宗教但是完好地保留着自己原有的族群属性和族群认同。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而卡力岗人却因改奉宗教而引发了族属演变，随着伊斯兰教被接纳，其形成一个既有别于“母族”，又不同于周边“他族”的特殊文化共同体，这对于研究信仰与变迁的关系，研究改奉宗教与族群演变、改奉宗教与族群认同、改奉宗教与族群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

曾经有学者质疑卡力岗现象的真实性，提出了“迁入说”^①等观点。但是，爬梳历史文献、民族学资料及田野调查所获，均显示“迁入说”缺乏有力的支持，由周边迁入的只是少量村民。反之，却支持了“族群演变说”。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的推动下，卡力岗人逐渐建构起了回族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完成了其族群认同演变的第二个阶段，从文化共同体过渡为权利共同体。该阶段的族群认同建构，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族群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微观视角，这是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之二。

卡力岗现象还是我们目前能够观察到的“改奉宗教与族群演变和族群认同建构”的完整的典型案例，其既具有多元文化互动下的族群认同的自然变迁阶段，也有民族国家建构族群认同的完整过程。正因为如此，卡力岗人的个案才引起学界持续关注，一般意义的文化融合都无法与其比拟。

卡力岗人族群认同演变的研究价值还不仅仅如此。目前，还有4000多“卡力岗藏族”没有改奉伊斯兰教，他们的祖上与演变为回族的卡力岗人同为一个部族，如今亦同居一隅^②，却完好地传承着藏族的信仰与族群认

① 有学者认为，卡力岗人是周边的回族迁入该地区与当地人融合而形成的。历史资料显示，卡力岗人中，确有从周边迁入的回族，但人数极少。调查得知，卡力岗最大的德恒隆乡，其55个自然村中，只有两个村是母语为汉语的回族村，其村民是从周边迁入的回族，一个是纳加村，有66户人家，另一个是有116户的安措，两个村加起来也只有182户，仅占德恒隆乡2541户的7.1%。排除杂居或者不能确定是否迁入等因素，迁入的回族也会大于8%。可见，迁入的回族在卡力岗人中只占极少数，调查结果并不支持“外迁说”。

② 目前这部分藏族大部分聚居在德恒隆乡的若索、哇西、西后加、加家四个藏族村中，另有少部分与回族杂居在团一、团二两个村中。

同。这两部分卡力岗人共同经历着文化变迁，而历史的列车却驶向不同方向，是什么力量改变了历史发展方向？这部分卡力岗人是解开这一谜底的不能或缺的对照样本，这使我们今天除了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研究这一现象之外，还可以借助“卡力岗藏族”开展实证性的比较研究，从而，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其独特的文化变迁梯度和认同防御层次，可以让我们在普遍意义上，用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来观察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来探究族群认同的建构条件，分析族群演变的过程与原因。可以说，卡力岗文化现象的完整性，使其成为人类学难得的研究案例，这是其研究价值之三。

调查显示，目前，卡力岗人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使用自己的母语^①，即藏语的安多方言。语言作为最具稳定性的文化要素在卡力岗文化变迁中完整地体现了出来。我们观察到，在社会交往和社会流动中占据主位的卡力岗男性，目前的双语使用率较高，这固然有国家推行义务教育的作用，但是，年龄组统计显示，低龄男性的藏汉双语比例与高龄男性的双语比例的差别并没有想象得那样巨大，而高龄男性村干部（包括曾经的村干部）的双语比例却明显高于普通高龄男性村民。也就是说，卡力岗男性第二语言的能力并不都是来自学校教育，而是文化变迁的一部分。语言的研究是其研究价值之四。

可以说，我们有幸正在“目睹”一幕族群演变与文化变迁历史剧的“尾声”，这对于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何等的幸运与弥足珍贵，其研究价值无需再述。

卡力岗人为什么会选择伊斯兰教而放弃藏传佛教？这一选择为什么会

① 语言人类学研究显示，一个社会的男女语言使用的差异现象，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化程度决定的。由于历史性的分工模式及所造成的社会化程度的差异，女性往往比男性保留更多的传统文化元素，如服饰、语言等，由于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了其使用者的交际范围和使用的种类与水平，因此，在男权社会，受社会交往需要的影响，能够使用多语言的人群往往首先是男性，而女性往往是本族语言的最后使用者。本调查显示卡力岗人中60岁以上男性村干部的双语与三语使用率明显高于一般男性。由此，笔者认为，绝大多数女性只能使用藏语的村庄，该村庄人群的母语就是藏语，这些村庄原为藏族村寨部落，因“随教”而逐渐演变成为回族的聚居地，而绝大多数女性使用汉语的村庄则是迁入卡力岗地区的、母语为汉语的回族，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同样是因“随教”而演变为回族的。

导致族群认同的改变？其结论是否能够指向认同建构的谜团？是什么使一个群体自我认定为所归属的类别？国家在场对于民族身份的建构有着怎样的意义？国家语境与地方语境之间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在卡力岗这样的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三多地区”，这种族群演变及认同建构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这些问题本身的“学术级别”就使卡力岗现象研究具备了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解释此类特殊现象的主要理论与路径

从皈依伊斯兰教到社会文化的改变，从“安多哇”到“哦回”族群认同的演变，从地域性的族群认同到国家层面制度化的民族认同建构，是卡力岗现象的三个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从外在变化来看，是信仰改变引起了族群演变，而内在实质却是改奉宗教所造成的观念上的根本性变化在社会、文化、制度上的体现，是一系列自我认同与他认同的建构与再建构过程；更深远的理论关怀则是观念与制度的关系、族群性与族群认同的关系、社会变迁与变迁动力的关系问题，其中还贯穿着族群与民族、政治与民族认同、宗教与社会等诸多的问题。爬梳以往揭示此类特殊现象的基础理论、观点与成果，是本研究的起步与开始。

一 族群理论

族群认同研究无法回避对族群概念的认识与讨论，何为族群不仅是本研究对象的界定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理论问题。本研究的起步就关涉了族群概念的辨析与讨论。

（一）族群概念的形成、语境与背景

族群一词，形成于西方，其在英语国家出现的并不算早，大致以 20 世纪 50 年代为界线，之前，更多地使用 race（种族）、people（人）、tribe（部落）来区分人口和指代不同人群，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ethnic groups（族群）逐渐替代 races（种族）一词，成为指代人群的主要词汇，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受到了民权运动和反种族歧视的影响，二是社会精英的推动作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黑人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权利的大规模民权运动，他们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民众的巨大压力下，美国国会于 1964 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1965 年通过《选举权利法》，正式以立法形式结束了美国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结束了在选举和各种公共设施使用方面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在民权运动和种族平等观念的推动下，反对种族歧视的社会思潮逐渐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1950 年，由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Claude Lévi-Strauss）、英国生物进化论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瑞典经济学家古纳尔·迈尔达（Gunnar Myrdal）等世界著名学者共同签署了“种族问题”报告，该报告指出“各种国家的、宗教的、地域的、语言的和文化的群体并非必然与种族群体相一致；这些群体的文化特征并没有显示与种族特征有遗传基因的联系。当‘种族’被运用于流行用语时，通常都会犯上述类似的严重错误，因此，这些宗教建议当谈及人种（human races）时最好完全不用‘种族’（race）一词，而用‘族群’（ethnic groups）”。^① 这份形成于 1950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由众多世界著名学者共同签署的报告，将 *ethnie* 作为 *race* 的对立面提出，强调了族群的文化性、社会性、历史性和建构性，意欲消除 *race* 生物血缘在族群概念中的地位和造成的混乱，从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ethnic group”逐渐成为欧美社会人文学科的流行术语。^②

据翁乃群教授考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15 世纪前英文中的‘ethnic’，是源自于希腊语形容词‘ethnikos’，即意义为‘异族的’（gentile）、‘异国的’（foreign）。而希腊文形容词‘ethnikos’则是源自于希腊文名词‘ethnos’（人民、国民、异国人）。在翻译《希伯来圣经》时，希腊文‘ethnos’又被用作为希伯来文‘gōyīm’，即‘gentile’（非犹太人）的译文……1728 年之后，虽然其形容词形式‘ethnic’仍被使用，但其被赋予的‘gentile’（非犹太人），以及相关‘heathen’（异教徒、未

① 翁乃群：《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中国研究》2009 年春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② http://en.wikipedia.org/wiki/Ethnic_group; A. Metraux (195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ecurity Council Statement by Experts on Problems of Race”,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3 (1): 142-145.

开化的人) 意义的英文名词形式 ‘ethnics’ 则基本消失了。或许是因为其形容词意义的不断扩延, 在 1945 年, 其名词意义以 ‘ethnic group’ 的形式重新出现, 并延续至今。”^① 由此看来, ethnic 一词本身就有边缘的、非主流的文化含义。^② 术语流行的结果之一就是外延的扩大而引起概念的庞杂和混乱, 而当族群一词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渐成为流行术语后, 其所具有的文化情境的“原罪”, 更加导致了这一混乱的加剧。虽然, 看起来“种族问题”报告似乎解决了这一概念的使用问题, 但事实上, 随着使用学科与领域范围的扩大, 对族群概念的争议也才刚刚开始, 并伴随着族群认同、族群边界、族群身份、民族、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国家意志、社会实践等词汇的使用及研究分歧而日益加剧。

(二) 西方定义族群的方法取向与多元化发展

爬梳西方定义族群的方法取向与视角, 大致可以分为主观、客观与综合三大类, 主要有文化论、原生论、场景论、边界论、想象论与象征论等, 另有一些观点则兼具综合特征。无论是上述何种定义方法取向均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而主观视角的定义取向多元化则更加突出。

主观定义族群的方法取向中最广为人知的是场景论, 也称工具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族群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共同体, 而建构的力量来自于生存策略、利益、国家等外部力量 and 不同场景。人类学家罗奈尔德·科恩 (Ronald Cohen) 是该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科恩认为, 当下社会科学研究者对族群的识别往往反映的是错误标识而不是土著的本相。“族性/族群特点” (ethnicity) 是构造一系列“包括”和“排他”的二分法。族群性在边界要求上可以根据政治动员的需要或窄或宽。

人类学家琼·文森 (Joan Vincent) 也同样指出, 族群界线是被构建的, 也是常常变化的。^③

① 翁乃群:《国家和地方语境下的族群认同》,《中国研究》2009 年春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②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4 期。

③ Cohen, Ronald (1978), “Ethnicity: 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in Bernad Siegel, Alan Beals and Stephen Tyler (ed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7, Palo Alto: Annual Reviews Inc.